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方勇 主编

孟子

方勇 评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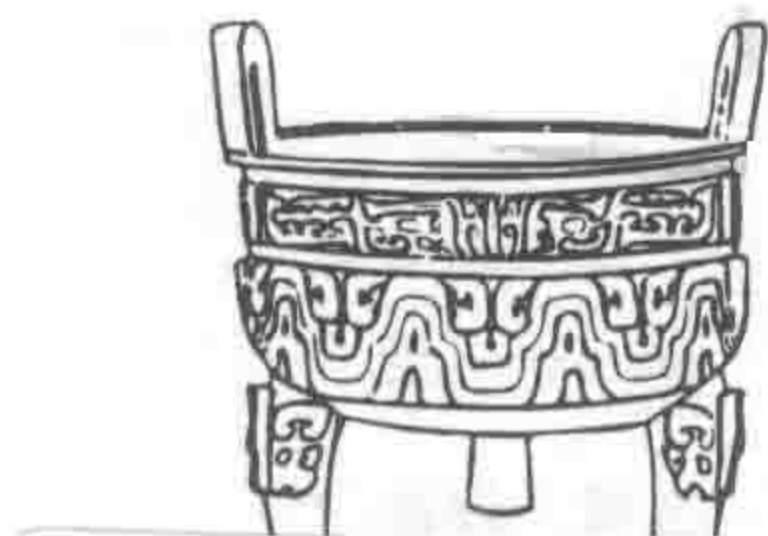
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方勇 主编

孟子

方勇 评注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/方勇评注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7
(诸子现代版丛书)
ISBN 978-7-100-14028-7

I. ①孟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儒家 ②《孟子》—译文 ③《孟子》—注释 IV. ①B22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25944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孟子

方勇 评注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4028-7

2017年10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3 1/4

定价:46.00 元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学术顾问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李学勤 陈鼓应 陆永品

钟肇鹏 卿希泰 傅璇琮

主 编 方 勇

策 划 厚艳芬

总 序

方 勇

春秋战国之际,王道衰微,诸侯异政,礼乐崩坏,事不稽古。其间诸子,究际天人,异说郁起。老庄述道,孔孟言礼,墨翟执俭,申韩持法,其余诸家,亦各申己见,激辩争鸣。承流而枝附者,不可胜计,诸子之学,勃然而兴,诚为中华文明之活水源头。

自汉武改运,百家罢黜,儒术独尊,然子学一脉,承传绵延,代有兴发,不绝如缕。清末民初,旧政易制,西学东渐,儒学独尊地位不再。章太炎、梁启超、钱穆、吕思勉、冯友兰、于省吾、严灵峰诸君,各奋勤智,推究诸子,彰明百家,子学重现繁荣之貌。方今之世,政通人和,文运昭回。学界同仁,秉承诸子精神,整理诸子文献,述道言治,持说论辩,子学全面复兴之势,不可遏抑。

子学之全面复兴,其要有四:一曰整理文献;二曰精研学术;三曰传承精神;四曰推广文化。四要之中,整理文献奠其根基,精研学术掌其主干,传承精神运其枢纽,推广文化辅其侧翼。夫四要者,方今学者所推重者也。学界群贤,或专治一要,或数要并攻,各逞高论,共襄复兴之盛事。《诸子集成》《无求备斋诸子集成》《子藏》等子学文献整理丛书相继刊行,子学文献之整理愈发扎实厚重。《诸子学刊》《管子学刊》《老子学刊》《孔子学刊》《诸子研究丛书》等子学研究丛刊、丛书亦渐次问世,持续推动子学研究向纵深

发展。合而观之,当代子学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,均有长足进步。然子学精神之提炼传承、子学文化之普及推广尚显薄弱。子学精神者,曰人格独立、精神自由,学派之间平等对话、互相争鸣,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,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之精神也。子学精神贯穿历代子学发展之始终,实为诸子学说流衍之内在动力,乃子学承传延续之真脉。新时代之子学,当以承传发扬子学精神为己任,推陈出新,彰显当代子学之风标。再言子学文化之推广:诸子持论迥异,流派分明,各有传授,加之世事时局之影响,虽源远流长,却多持于士大夫、文人学者之手,并未在民间广为流传。然则诸子之学,本非束之高阁、囿于书斋之案头学术,而实为导世化俗、作用当下之实学。子学研究若清谈理论,不能化为时用,纵汪洋恣肆,亦难免于空疏之责。是故当代之诸子学术,务期以昌明国法,启蒙民智,摧邪辅正,去伪存真。故曰推广子学文化为子学复兴之辅翼,不可或缺。唯有深度与广度之二维拓展,方可引领子学之全面繁荣。

方今时代,与先秦相类,文化多元,议论蜂起,传统与革新同在,危机与机遇并存。固守传统、推尊一家,已难以独擅学林。传统文化、学术之转型,势在必行。由是,根植传统文化沃土而离脱旧学窠臼、融通中西思想方法而延续民族真脉之“新子学”应运而生。“新子学”之时代任务有三:一曰提炼并弘扬子学精神。以子学精神为导引,方可重拾独立、自由、平等、共生之优良传统,进而消解旧学专制、偏激、排异之流弊,从而锻造当代多元、会通之学术、文化。二曰重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。“五四”之际,旧学统治崩坍,除旧立新之声四起,加之西学涌入推助波澜,新文化运动席卷

中华大地,是故中国传统学术承传递嬗之脉络暂告中断。学界多依傍西学体系,以期重构中华学术。《诗》归文,《春秋》入史,《论》《孟》归哲。就其形式而言,可谓大致实现传统到现代之转型。得益于此,中华学术亦得以挣脱桎梏,获得长足之进步。然就其实质而论,中学之血脉未能全合西学之骨络,使现今学术,表里不一,精神尽失,不能与西学平等对话,于世界范围几近失语。揆诸当今形势,中华文化之复兴,既要植根于传统,又须着眼于世界。其话语体系之重构,迫在眉睫。诸子之学,凝聚先人智慧哲思,为中华文化学术之源头,民族话语系统之柱石。“新子学”脱胎于传统子学,兼有融通中西之思想、契合当前再造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之要求,当成为革新学术、重塑精神之中坚。三曰全面复兴子学,引领当代之国学。先秦之际,百家之说虽隐显各异,实则无高下之判。汉武推孔氏,黜百家,遂有经子之分野。传统国学,以经学为主导,因循守旧,排斥异端,以致抱残守缺,丧失创造革新之能力。“新子学”力主退经还子,全面复兴诸家之学,由此构建兼容经儒、并包诸子之开放体系,缔造包罗万有、生生不息之崭新学术,引领当代国学之发展走向。近两年间,学界先后数次召开高端学术研讨会,问脉“新子学”,有关“新子学”之议论亦持续升温。讨论日趋深入,“新子学”亦渐入人心,其理念、体系、方向已获学界多数朋友认同。“新子学”已崛起为当代主流学术之一。革新传统子学,缔造全新学术亦由此成为当前子学发展之风向标。恰值此时,商务印书馆欲刊行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,此举无疑顺应时代之要求,符合子学发展之规律,与“新子学”之理念不谋而合,实为复兴诸子之学、弘扬百家文化之新鲜血液。

20世纪以来,子学著作之整理成果颇丰。《诸子集成》《新编诸子集成》《诸子集成续编》《诸子集成补编》《无求备斋诸子集成》等大型丛书先后推出。《子藏》前两批成果之面世将子书整理推上另一高峰。《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》亦选入部分子书,另有某子之注译、选译单行本等等。就当前成果而言,《子藏》等大型丛书固然体系宏阔、内容丰赡,然其以整理元典为要,以保留子书原貌为先,文献价值虽高,却因语言古奥不利于大众之接受。今人之注译、选译,化繁为简,变古为今,易传播于当今,然各成一家,不成体系,标准不一,良莠不齐,恐有泥沙俱下、以讹传讹之虞。由是看来,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出版,顺时应势,甚为必要。该丛书精选诸子百家之善本,全面注译原文。子书以刘勰所谓“诸子者,入道见志之书也”为标准择选,即诸子为诸子百家之子,而非经史子集之子。诸子之涵盖范围循章炳麟《诸子略说》之言,即“所谓诸子学者,非专限于周秦,后代诸家,亦得列入,而必以周秦为主”。另,篇首设题解,篇尾设评析,前后呼应,解读通篇大意,论析主要观点,导引读者接受。丛书全注全译,博采众长,简明晓畅,务求变古奥为浅近,化艰深为平易。题解、评析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,力争符合史实,通达精到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编成,文献价值与可推广性兼而有之,对当代子学之复兴与繁荣必有强劲之推动作用。

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编撰宗旨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,振兴中华民族精神。该丛书就文献价值而言,择选版本精善,体系构建谨严,持论平允适当,与《子藏》等诸子丛书相类,当成传世之经典。就其学术价值而言,立足于经典传承,着眼于文化普及,揭百家之面纱于众生,显诸子之精神于当世,使诸子当下之学之本质得以回

归,大利于子学之普及与推广,无疑契合子学全面复兴之要义。就其现实意义而论,创新学术,彰显时代之风标,有益于大众对民族文化之认同,亦有益于提升华夏文明之世界影响与地位,从而助力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之重构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面世,得益于学界整理诸子文献,创新百家学术之长期积淀,《诸子集成》系列丛书、《子藏》《诸子研究丛书》、“新子学”等均为其提供了丰富滋养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成书,亦是子学转型发展之必然,从传统到现代,自精英及大众,由封闭而融通,预示着当今子学发展已步入“新子学”阶段,子学之全面复兴,势在必然。

一人之立,尚需精神;一国之立,何能无精神而自行?耽于功利,惑于途说,大言炎炎,小言詹詹,所谓中国者竟何谓乎?诸子百家之学,源远流长,承传绵延两千余年而不减其泽,实为中华文化与精神之活水源头。当今中国之崛起,民族之复兴,实应以精神之回归、文化之传承为保证。归根返本,正本清源,正待其时。当代诸子之学,当汇纳百家以成不朽,淘沙取金以锻精神,引领文化、学术之走向,助推民族、文化复兴之实现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为当代诸子学之力作,必将于未来之学术与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,成就一代之经典。

2014年9月15日

导 言

一、孟子其人

孟子,姓孟名轲,战国时邹(今山东邹县)人,生卒年不详,大约晚于孔子百年左右。不仅其生卒年不详,就是其籍贯、名字、生平活动、师承关系以及先祖等,都因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而不可确考,给后人留下了无数言说的空间。以下就上述几个方面略作简要叙述,让读者对孟子其人既有整体的认识,也对孟子留下的谜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。

孟子名轲,此是孟子自称,历来无人有异议。但其字,早在西汉司马迁以及东汉赵岐时,就已不可知晓。赵岐在《孟子章句》题辞中说:“孟,姓也,子者,男子之通称也”,“名轲,字则未闻也。”到了魏晋以后,却有人提到了孟子的字。一般认为最早始于王肃,其《圣证论》以及可能是他所作或门人假托的《孔丛子》都提到孟轲字子车。之后还有字子舆、字子居之说,但这些说法终究不可靠,仅供参考而已。关于孟子生卒年更是众说纷纭,杨泽波教授归纳历史上有关孟子出生时间的看法为九种:元张颢认为是公元前 444 年,罗根泽认为是公元前 438 年,明陈士元认为是公元前 401 年,明末黄宗羲认为是公元前 397 年,钱穆认为是公元前 390 年,清代

魏源认为是公元前 385 年,清宋翔凤认为是公元前 382 年,清臧庸认为是公元前 376 年,最晚则是多数学者所持的公元前 372 年(见杨泽波《孟子评传》)。卒年也无定说,一般根据《孟氏谱》所记载的 84 岁,而定为公元前 289 年。各种说法都因为缺乏详尽可靠的材料而流于推测。

因孟子生卒年难于落实,所以研究有关他的生平活动也只能根据《孟子》一书以及《史记》等其他一些资料来考察,其中钱穆先生的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最具代表性,成果也最为突出。可以确定的是,孟子一生四处游历,努力宣传自己的学说并梦想着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,他先后到过齐、宋、鲁、滕、魏等国,并一度做过齐宣王的客卿,力主正人心而存仁义,法先王而行王道,但终因其言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(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),不为统治者所用,后回邹,“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,述仲尼之意,作《孟子》七篇”(同上)。

孟子是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,其父母名字不可确考,按照明代陈士元的说法,孟子父亲名激字公宜,母亲仇氏。到孟子时,家道已经衰落,他幼年丧父,主要在母亲的教育下长大,因此在《列女传》和《韩诗外传》等书中记载了不少孟母教子的故事,诸如孟母三迁、杀豚不欺子、断织劝学等。这些故事虽然不一定是真实的,但起码说明孟母善于教子,孟子在少年时代有良好的教育环境,这从《孟子》一书特别重视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可以看出来。孟子具体师从于谁,我们已不得而知,但孟子与孔子的孙子子思有着较深的渊源是公认的。荀子在《非十二子》中就把孟轲和子思列为一派,后来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说他“曾受业

于子思之门人”，赵岐则直接认为孟子的老师就是子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《五行》以及郭店楚墓竹简《五行》的分别出土，基本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，学术史上也确实存在一个思想传承密切相关的思孟学派，孟子与子思之间有实质性的思想传承关系，因此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可信的。孟子博学多闻，通五经，尤长于《诗》《书》，并授徒讲学。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，被后人尊封为“亚圣”，人们习惯上把他和孔子合称为“孔孟”。

通观《孟子》一书，孟子作为一个儒士和游说之士，在与人谈辩说理时，常常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，即使是面对君王，他也绝不会因其位高权重而放弃自己的行事风格，“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，更不会为了得到重用而委曲求全，改变自己的理想，正如他宣称的那样，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，体现出一种浩然之气与大丈夫精神。

当然，孟子也有其平凡化、生活化的一面。如《公孙丑下》记载有这样一件事：孟子批评齐国大夫蚺蛙作为治狱官却不积极向王进言，结果蚺蛙因齐王不听进言而辞职。于是齐国就有人讽刺孟子说：“孟子替蚺蛙想的主意是不错的，但是他怎样替自己考虑呢，那我还不知道。”孟子学生把这话告诉了孟子，孟子却解释说：“我听说过：有固定职务的，如果无法尽其职责，就可以不干；有进言的责任的，如果言不听、计不从，也就可以不干。我既没有固定的职务，又没有进言的责任，那我的行动难道不是宽舒得有无限回旋的余地吗？”孟子为自己的“无作为”找了一个堂皇的借口。我们从中

看到了一个与积极进取、有大丈夫气概不一样的孟子。孟子有时还赌气行事。如他做齐卿时，盖邑的大夫王骥曾以副使身份与他一起去滕国吊丧，因孟子以为王骥喜独断独行，竟在来回的路上很长时间内，没有与他谈论过公事，以至于其弟子公孙丑十分惊讶。孟子对失利有时也惆怅满腹。“孟子去齐”章记载：孟子的主张不被齐王接受，因此离开齐国，在路上，弟子看出了他的失落，问道：“您似乎有不快乐的样子。我前些天还听您说过：‘君子不抱怨天，不责怪人。’今天又为什么如此呢？”孟子感叹说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呀。从历史看，每五百年就应该有一位圣王出现，而且还会有命世之才从其中出来。从周武王以来已七百多年了，论年数和时势都应该有圣君贤臣出现。也许是上天不想使天下太平吧；如果想，在今日的社会里，除了我，还有谁呢？我为什么不快乐呢？”孟子自认为有命世之才，自信心爆棚，但面对现实的不如意，他怅然若失，把这一切归之于天命。

二、《孟子》其书

《孟子》是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中得以幸免的少数子书之一。赵岐说：“秦焚灭经术，坑戮儒生，孟子徒党尽矣，其书号为诸子，故篇籍得不泯绝。”（《孟子章句·题辞》）因为能够直接流传下来，所以《孟子》一书的文字较少有争议，仅其作者和篇数有一些不同看法。

（一）《孟子》的作者

《孟子》一书的作者尚无定论，至少有三种说法：一是孟子自

著,此说最早来自汉代赵岐的《孟子章句·题辞》。他说:“此书,孟子之所作也,故总谓之《孟子》”,“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、万章之徒难疑答问,又自撰其法度之言,著书七篇。”赵岐认为虽有弟子参与,但是孟子自撰法度,乃自己所作。之后宋代的朱熹、清代的阎若璩都赞同此说。二是师生合著,最早的说法来自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。司马迁说:“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,述仲尼之意,作《孟子》七篇。”严格说,司马迁的说法有歧义,既可以理解为孟子与其弟子共同完成《孟子》一书,也可以理解为孟子与弟子一起序《诗》《书》、自己作《孟子》。赵岐的说法实际上是对后一种理解的发挥,强调了“自撰”的性质。三是弟子辑成,此说来自唐代韩愈的《答张籍书》。韩愈说:“孟轲之书,非轲自著。轲既歿,其徒万章、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。”后来宋代晁说之、清代崔述进一步证明此说。

应该说,司马迁的说法较为公允。孟子晚年,与弟子研读《诗》《书》,讨论学说,按常理,自己应该会有所记录,其弟子也有补充,甚至可能有所整理。如果说全书都是孟子自撰,且不说崔述等人提出的书中诸侯都称谥等问题不好解说,就是从现存《孟子》一书看,有些篇章明显是从旁观者的视角来描写的,也显然不是孟子自己叙述的口吻。无论其作者是谁,《孟子》一书真实地反映了孟子的思想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,它是我们今天探寻孟子思想和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。

(二)《孟子》篇数及其《外书》

《孟子》的篇数,历来只有七篇与十一篇两说。司马迁所见《孟子》为七篇,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则说有十一篇,都无篇名。《艺文

志》较《史记》多出的四篇被赵岐标注为《外书》，他说：“又有《外书》四篇：《性善》《辩文》《说孝经》《为政》。其文不能宏深，不与内篇相似，似非孟子本真，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。”赵岐认为《外书》四篇是后人仿效而作，其判断是可信的。因为《孟子》每篇命名都仿照《论语》，取篇首句中的二三字为篇名，与本篇内容无实质性关联。而这四篇的命名显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，与前七篇命名规则不合。从四篇篇名看，它们都是对孟子思想的提炼，特别是《性善》与《为政》，更是孟子学说的核心。因此其最有可能的作者是孟子后学，也许就是马王堆汉墓帛书《五行》篇中“说”文的作者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《外书》四篇作于司马迁之后，班固之前。

司马迁距孟子时代近，所见七篇应该是《孟子》本来的篇数，《艺文志》载的十一篇应该包含了孟子后学所作的四篇。《史记》明言七篇，但不知班固为何没有对“十一篇”说作出说明。赵岐为七篇作注而舍弃《外书》，之后一直至今天，七篇成为一个定数，其间仅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录有南朝梁綦母邃《孟子注》九卷，但已亡佚。四篇也偶尔有人提及，如宋代孙奕《履斋示儿篇》、刘昌诗《芦蒲笔记》。明代姚士粦伪托有宋人熙时子注的《外书》四篇，流传至今。

赵岐说《孟子》有二百六十一章，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。从赵岐《孟子章句》到今天各种版本，七篇是一致的，只是在章数上有点出入。赵岐《孟子章句》为二百六十一章，朱熹《孟子集注》为二百六十章，清焦循《孟子正义》同赵岐，今人版本多同朱熹。原因是赵岐把《尽心上》的“孟子自范之齐”与“王子宫室”分为两章，而朱熹合为一章，内容并没有增减。

三、孟子的思想

(一) 孟子的天人观

天人观是先秦诸子共同的话题之一,孟子谈论的重点虽然在人的方面,但对天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有较明确的定位。孟子天人观基本继承了孔子“下学而上达”(《论语·季问》)即由人及天的路向,认为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。知其性,则知天矣。存其心,养其性,所以事天也”(《尽心上》)。从道德义理的层面讲,孟子的天是一种超越于人之外的存在,是主宰万物的一种无形力量,所以他说“君子创业垂统,为可继也。若夫成功,则天也”(《梁惠王下》),“行或使之,止或尼之。行止,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鲁侯,天也”(同上),“顺天者存,逆天者亡”(《离娄上》),因而要“事天”。孟子虽然对天的力量抱有敬畏之心,但是他却常常把天置于远端,仅看作是一种不时时作为的无形力量。他更看重天人观中人的作用,说得更多的也是“仁义礼智,非由外铄我也,我固有之也”(《告子上》),强调尽心、知性,即扩充四端而懂得人的本性,把“知天”看作是尽心、知性水到渠成的结果,而不是作为一个终极性的目标。就是说,在孟子那里,天与人是对相对独立的存在,但已经有了融合的趋向。

(二) 孟子的身心观

身与心是孟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对范畴,《孟子》一书多处论及,最为集中的是《告子上》。孟子对身心观的基本看法有三个方面:

第一,从官能角度看,身心都属于人体的一部分,具有普遍性。

《告子上》云:

口之于味也,有同耆焉;耳之于声也,有同听焉;目之于色也,有同美焉。至于心,独无所同然乎?心之所同然者何也?谓理也,义也。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义之悦我心,犹刍豢之悦我口。

在孟子看来,心对于理义,正如口对于味,耳对于声,目对于色,它们各有所重,但都是人官能之一体。作为官能,不同处在于大体与小体,所以孟子云:

人之于身也,兼所爱。兼所爱,则兼所养也。无尺寸之肤不爱焉,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,岂有他哉?于己取之而已矣。体有贵贱,有小大。无以小害大,无以贱害贵。养其小者为小人,养其大者为大人。……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,而不知也,则为狼疾人也。饮食之人,则人贱之矣,为其养小以失大也。饮食之人无有失也,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?(《告子上》)

心之官属于大体,耳目之官属于小体,但贵贱大小都属于体,应“兼所爱,兼所养”,既要养心,也要养身。这里的大小贵贱之分也是相对的概念,如一指相对于肩背为贱、小,心相对于口腹、耳目为贵、大。

第二,从价值角度看,心是实践主体能够实现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和基础,属于大体,而身只是一种物质的存在,是小体。孟子认为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(《公孙丑上》),这种心是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等道德价值的根源,也是仁义礼智得以保存的基础,故孟